

葛兆光教授

榮譽人文學博士

尊敬的香港教育大學校董會主席黃友嘉博士、各位校董會成員、校長張仁良教授、各位教職員及親友，大家好。

獲頒香港教育大學榮譽博士，是莫大的榮譽。我和其他兩位，陳一丹博士和張藝謀導演都心存感激。我知道，有資格獲得這一榮譽的人很多，我們只是其中的幸運者。我也知道，這個榮譽表達的，是香港教育大學對學術研究、藝術創造與社會服務的鼓勵，而我們剛好是被選中呈現這一願望的人。所以，在感恩的同時，多少也略有些不安。

藉著這個隆重典禮的機會，請允許我講一些感受。這幾年，人們都在談論世界的「不確定性」，我不知道其他兩位心裡的感覺如何，我也充滿了對未來「不確定」的困惑感。原本看上去勢不可擋的全球化，現在似乎被逆全球化或國族主義潮流突然剎車；原本應該成為常識的普遍價值，現在好像又變得晦暗不明，以至於是非難辨；各種制度之間原本已經開始融合的趨勢，現在好像又回到勢不兩立的狀態；而所謂「文明的衝突」，好像也從語言風俗、宗教信仰、意識形態的差異，逐漸演變成真槍真炮的戰爭。無論是學者、藝術家還是實業家，我見到很多朋友，都處在惴惴不安的心境中。

那麼，在這充滿不確定的時代，還有甚麼是確定的？想來想去，我覺得好像只有「教育」。這並不是因為香港教育大學有「教育」二字，我才這樣說，而是真心地覺得，要讓價值重新清晰，讓秩序變得合理，讓不同的人有共識，就像張藝謀導演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中唱的那首歌，「我和你，心連心，永遠一家人」，不僅需要這一代努力，也要指望下一代。而下一代知識、觀念與價值的塑造成型，正端賴這一時代的教育，由於它才能決定未來世界會不會變好，因此，「教育」就顯得格外重要。坦率說，我們不是政治家，也沒有權力，只有著作、作品和良心，所以，也只能靠這些來影響下一代。

說到下一代，不禁想到我們這一代。這次獲頒榮譽博士學位的三位，都來自內地，我和張藝謀導演是同齡人，比陳一丹博士年紀略長，或許，我們這一代會有一些共同背景、共同經歷和共同記憶。由於今天獲頒「榮譽博士」，不由得讓我想起一件往事。這裡請允許我多說兩句個人的事情。二十多年前，一所日本著名大學聘我擔任客座教授，在聘任案的審查過程中，他們發現，這個將要擔任客座教授的人，居然既缺少高中學歷，也沒有博士訓練。委員會特意來信詢問原因，可是這個原因，花很多口舌也難解釋清楚。同樣的疑問，在十幾年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聘請我的時候，又發生過一次。我明白他們的困惑，這是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，所以根本不能理解，甚至不能想像有甚麼地方會無緣無故中斷正常的中學教育，有甚麼原因會讓一個人，無緣無故到了二十八歲才跨進大學之門。

我們這一代學歷的不完整，是那個時代造成的，而那個時代造成我們的學歷缺失，也逼得我們不得不總是回過頭來，多關心這個時代。我想，無論是張藝謀導演拍電影，還是我研究歷史，還是陳一丹博士投身公益事業，我們都看到，在中國，所有的不同領域的從業者，都不得不分神去關懷時代、關心社會、關注現實，這使得我們的工作和事業，從來不能成為單純的、技術性的專業。因為我們曾經滿懷希望，希望人不僅能「活著」，能「歸來」，而且希望人能夠受到教育，「一個也不能少」。也希望我們這一代失去教育，學歷不完整的歷史，今後在下一代身上不再重演。

被授予榮譽博士學位，是我們幾位的幸運，我們一定會盡我們的力量，對這個時代有所回饋。我想，陳一丹博士捐資建立學校，張藝謀導演拍攝電影，我進行歷史研究，可能領域和方向各不相同，如果要尋找我們之間、尋找我們和香港教育大學之間共同點，那就是「教育」，通過學校、藝術、公益和歷史，我們都希望培育出更多的，更完整的「人」。

謝謝各位。